

北大

老照片



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大老照片/李权之主编. -北京: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,1998.5
ISBN 7-80004-640-0

I. 北… II. 李… III. ①北京大学-名人-生平事迹-回忆录②北京大学-摄影集 IV. G649.2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0427 号

北大老照片

主 编 李权之

责任编辑 童 山

*

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
(北京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 28 号)

邮政编码:100710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东晓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大 1/32 开本 印张 6
110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
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20000 册

ISBN 7-80004-640-0

Z · 56

定价:10.80 元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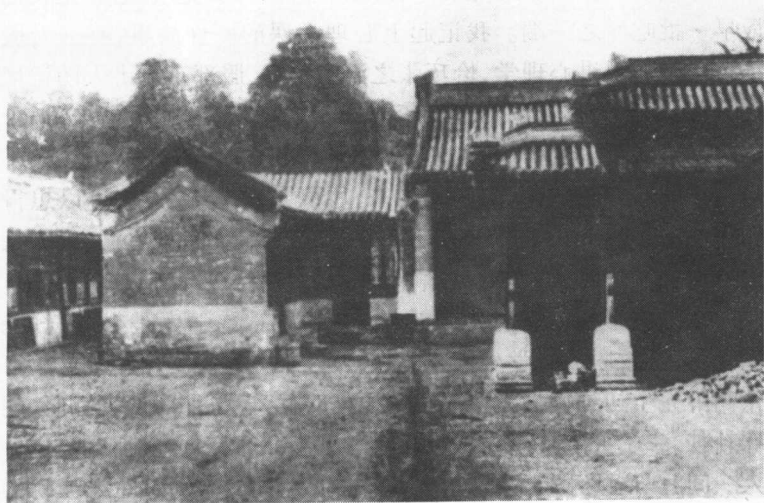
1. 邹树文 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 (1)
2. 茅 盾 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的三年 (8)
3. 顾颉刚 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(19)
4. 杨 晦 五四那天 (25)
5. 罗章龙 回忆“亢慕义斋” (32)
6. 斯 诺 毛泽东回忆北大 (37)
7. 周作人 北大感旧录 (42)
8. 寓 尘 “一二·一六”我在北大的队伍里
..... (56)
9. 吴相湘 马神庙·译学馆·汉花园 (64)
10. 马 珏 北大忆旧二题 (70)
11. 马伯煌 徒步三千 流亡万里 (75)
12. 周明道 令人难忘的叙永生活 (94)
13. 李钟湘 联大琐记 (101)
14. 杨道南 刻苦攻读 弦歌不绝 (110)
15. 江尚棋 泡茶馆 (114)

16. **邓嗣禹** 北大舌耕回忆录 (122)
17. **白婉清** 沙滩北大图书馆琐忆 (132)
18. **叶祖兴** 红楼琐忆 (136)
19. **马克垚** 图书馆读书琐忆 (142)
20. **谢冕** 回忆马寅初先生 (148)
21. **康式昭** 那时候我们多傻 (156)
22. **骆正** 那个岁月 (163)
23. **张岱年** 文革中的记忆 (177)
24. **季羨林** 记周培源先生 (183)

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

邹树文

我在壬寅年(1902年)入学开学的时候,还记得每日天还未亮,每桌点了蜡烛吃早饭,学生与教职员同桌进餐,如此开学不久,约有一个月光景,亦就放学了。那时用的是阴历,放学总在封印将近的日期。前清以12月下旬封印,那时候各衙门将官印封起,以便过年后再择日开印,所以封印与开印的时间以内,便成规定的假期了。



京师大学堂旧址

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时候,只有仕学师范两馆,其地马神庙,是从前的四公主府,亦即是戊戌京师大学堂旧地址。仕学师范两馆之创办,乃取古语“作之君作之师”的意思,创办的人当然有他一种伟大的抱负。仕学馆当时学生取的是在京官吏,我还记得同学中有一个达寿,他在入学时已是翰林,初开学时学生少,学生请假亦挂牌(用现在名词说是布告),达寿因“迎銮”请假,让我脑海中留下一个印象。

师范馆在仕学馆迁出以后,曾有一个短时期独做了马神庙的主人翁,那时教职员学生,甚至仆役,绝对没有一个女性,所以可当此“翁”字而无愧。我是第一班的最早一批,亦比较是最倒霉,因为四年的学制,硬教我们最早一批的人读了五年。这大概是张之洞及其他人等,与张百熙先生政见之争,让我们学生吃了苦。

有一天,有人问我那时候读的是什么课程,即有人插嘴说,大概多部分是经典。我们所读的书,并不如此,现代科学是占最大成份的。我们课程随不同时期章程之颁布,而有所更改,这亦是我们最早一批吃亏之一端。我记起上心理学课的一件故事,有一天服部宇之吉教习讲心理学,恰巧张之洞来查学,服部正在讲人的记忆力,说是中年的时候记不起少年或幼年的事情,因中年事多,把少年所经过的事遮盖了,等到老年的时候,往往把中年的事忘了,于是少年及幼年的事,反而浮现出来,所以人到老年,往往可以想得幼年的事了。这一小段对于记忆力的讨论,触怒了张之洞,以为是讥笑他老了。后来商定学堂章程时,曾一度要想取消心理学课程。

京师大学堂壬寅开办的初期,教职员对待学生是很客气的。吃饭时候,教职员与学生同桌,学生居上,教员坐在客位。总教习张鹤龄先生初到接吴汝纶先生的原任时候,着了那时的大礼服,朝珠补挂,拿了大红片子,到学生斋舍,见了面行交拜礼(那时我们每人一间)。这些礼貌,把那时的学生拘束住了,学生因此亦自动的人人自爱了,后来制度渐渐改变,饭厅上教职员与学生分桌,教职

员另桌，高坐堂皇了。到那时候的学校管理人，已不是“管学大臣”，而降级为“京师大学堂监督”了。我还记得第一任监督张亨嘉就职的时候，监督与学生均朝衣朝冠，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三跪九叩首礼，然后学生向监督三个大揖，行谒见礼。礼毕，张监督说：“诸生听训，”“诸生为国求学，努力自爱”，于是乎全部仪式完了。

在管学大臣制度将要废止的时候，曾就在校师范馆第一批学生选派了一二十个，分赴英美法德日俄各国留学，我那时是派赴日本而未去，及制度改变为大学堂监督以后，更不胜“不随仙去落人间”之感矣。

创办壬寅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先生，确尽了礼贤下士的责任。我听说张先生为聘请吴汝纶先生任大学堂总教习，吴先生最初不肯担任，张先生屡次敦聘，最后竟至于长跪不起，方始得了吴先生的首肯。吴先生应了聘以后，立刻说要到日本去，仔细考察一番，然后再到学校。吴先生于是即往日本去了，吴先生是文章经济极负时名的一位老先生，以高龄前往考察，接见日本朝野，参观各地各学校，自己与日人作笔谈，随即作详细的笔记。因为那时候的大学堂，等于一个初开办的教育部，所以吴先生的考察范围，亦就非常广泛。高龄作事，一丝不苟，亦就辛苦备至。考察回国后，即病了，一病即不幸长逝。



总教习张鹤龄



管学大臣张百熙

张管学大臣于吴先生故后,改聘张鹤龄先生担任为总教习。吴先生是桐城古文家,张先生是阳湖派古文家,同是学者,而各为一派的代表,亦是一种巧合。当时的京师大学堂,网罗了一时知名之士,如于式枚先生,李希圣先生,屠敬山先生,王丹瑶先生,或是高级职员,或是教习。张管学大臣与张总教习,对于青年爱护备至。我记得有一位教英文的助教,不很称职,我们几个学生反对他。那位

助教是有大来头的,自恃无恐,可是张鹤龄先生明辨是非以后,去见管学大臣,把那位助教辞去了。这件事幸在早期,倘迟至大学堂监督时代,这个学生早就被开除了。张百熙先生处于西太后时代,欲谋急进的办学,固不容易,而况张先生所网罗的知名而不得志之士甚多。张管学大臣为这些用人方面,亦颇遭时忌,所以百熙先生不能行其志而时遭掣肘了。

马神庙的校址,原来是前清一位四公主府。据说前清驸马,如欲与公主行夫妇之礼,必定要公主宣召,种种君臣分际相隔的手续,非常之繁琐,所以公主与驸马,往往不能和睦。惟独这位四公主一反向例,与驸马甚相爱好,生了好些子女。这位四公主亦可说是那个时代的改革分子。

我们第一班里的第一批学生,自从壬寅年阳历的12月17日入学,读了四年半,至丙午年的旧历年底结束了读书的课程。我们

同班外省保送陆续来的,当然比我们的修学期间短一些,可是与我们第一批在京考取的同班上课,同时结束。寒假休息的时候。正是我们毕业考的时候,次年开印以后,开始毕业考试,次年即是丁未年旧历正月,把将近五个年头的功课,几乎样样都要考,都是从开宗明义第一章考起,到那门功课的结束为止。这比较现在学校所谓毕业考即是学期考试,其苦乐难易不可以道里计了。考的第一堂是国文,其中有一篇作文题,我还记得是“淡泊以明志论”。那天学部尚书荣庆到场监试,看了题目,无话可说,但是他听到我们上午除本场外,还有一场,下午还有两场,则为之称奇,在他的意思,还以为每天只有一场呢!考了一共七天,每天如此,等到考完,我们每个都瘦了不少。

考毕以后,学生聚餐,我记得是在什刹海某处。服部先生说,你们毕业了,这个学堂就是你们的母校,还把母校两个字,讲了半天,因为这两个字在当时是从前没有听到的新名词,当时如不加解释,或许还要有“公校”的名词与母校二字相对待呢!



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

·百年沉钩·

京师大学堂

北京大学的初名,是京师大学堂。19世纪末,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狂潮,中国的民族危机日重,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运动开始兴起,并迅速高涨。废科举,兴学堂,以求“经济匡世之材”的呼声不绝于耳。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,京师大学堂于戊戌百日维新运动中创建。1896年6月,刑部左侍郎李端棻正式提议设立“京师大学堂”。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积极推动下,1898年6月,光绪帝下诏,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,尤应首先举办,以期人才辈出,共济时艰。7月14日,光绪正式下令,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,任命孙家鼐为第一任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。在梁启超

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“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”。这样,京师大学堂不仅是中央政府首办的全国最高学府,而且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关。

变法运动失败后,新政措施大都被取缔,惟京师大学堂“以萌芽早,得不废”。其后,清室顽固派力图将大学堂办成一读经的封建书院,但大学堂中寻求进步和革新的传统却延绵不断。研讨学术、探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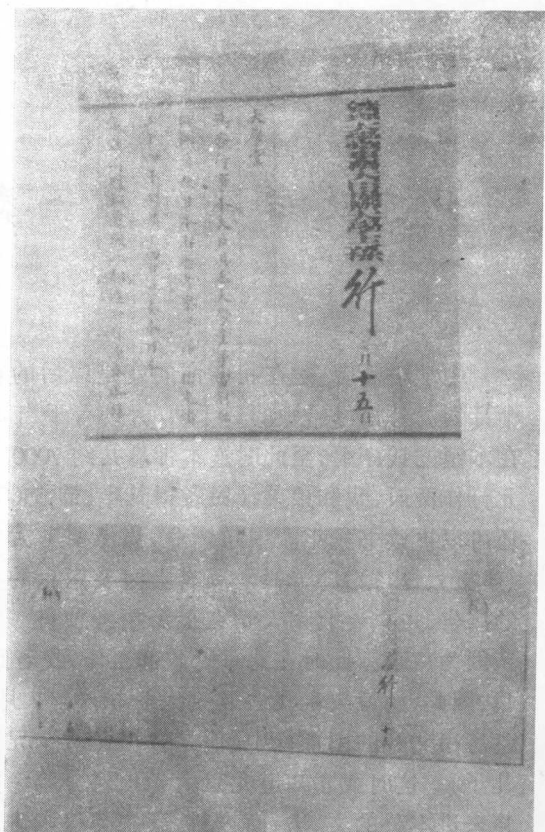


京师大学堂校匾

真理、学习科学、输入文明的努力，从未止息。

1900年夏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，大学堂横遭俄、德军洗劫，被迫停办。1902年初，迫于时变，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，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。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，大学堂于同年12月17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。在新中国成立以前，北京大学就以12月17日这一天为校庆日。

此后，张亨嘉、李家驹、朱益藩、刘廷琛、柯劭忞、劳乃宣先后担任总监督之职。经过十几年的发展，京师大学堂初具规模。



孙家鼐奏折

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的三年

茅盾

中学毕业后,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以后的求学问题。母亲早有个计划。外祖母给她的一千两(大约等于当时的银币 1500 元),存在本镇的钱庄上,至此时连本带息共约 7000 元之数。母亲把 7000 元分作两股,我和弟弟泽民各得其半,即 3500 元。因此,她认为我还可以再读书三年。中学毕业,当然要考大学。母亲本订阅上海《申报》,《申报》广告栏上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学或高等学校招生的广告,也登着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一年级新生的广告。母亲因为卢表叔此时在北京财政部工作,我若到北京,卢表叔会照顾我,因此,她就决定我去北京大学求学。7 月下旬我到上海,住在堂房祖父开的山货行中(他是曾祖父八个兄弟中最小一个兄弟的儿子)。这时我才知道北京大学预科分第一类和第二类。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、法、商三科,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。报第一类的,只考国文与英文。我自知数学不行,就选择了第一类。

考试分两天,都在上午。第一个上午考国文,不是作一篇论文而是回答几个问题。这些问题是中国的文学、学术的源流和发展。第二个上半天考英文,考题是造句、填空(即一句英语,中空数字,看你填的字是否合格,合格了也还有用字更恰当更优美之别)、改错(即一句中故意有错字,看你是否能改正,或改得更好)、中译英、英译中。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。

我回家后,天天留心看《申报》。因为被录取者将在《申报》广

告栏刊登姓名。等了约一个月,果然刊登出来了,却是沈德鸣,家里猜想鸿鸣字形相近,故而错了。幸而不久,学校来了通知,这才知道我考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。

这是1913年夏。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第一次招收预科生,而且第一次到上海来招生,这对于长江以南各省中学毕业生想考北京大学者,是一大方便。

这年我虚岁18,实岁17。



1914年茅盾在北大预科班

四叔祖在上海遇到一家姓谢的,叙述家世,原来这姓谢的父亲也和曾祖父同在梧州做官,因而彼此间凭此世谊,往来亲密。四叔祖知道谢家一个儿子名唤砚谷的,也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,就约他和我同乘轮船到天津再转乘火车到北京。谢家十分愿意。四叔祖就写信通知母亲。母亲正愁我路上少伴,得信后十分高兴,并函四叔祖约定于9月间动身。

我届时到了上海,也住在四叔祖那里,等待谢砚谷。那个大商人知道我是去北京求学的,对我很客气,派人陪我到处玩玩。上次来考预科时,我曾住在堂房叔祖的山货行里,这次我又来了,理应拜见他老人家。

这样,热闹地过了二三天,然后同谢砚谷乘轮北上。在这二三天内,我跑遍了上海各书坊,无意中买到一部石印的《汉魏六朝百

三家集》。

在三日三夜的海程中,我与谢砚谷相处极熟。谢比我大二三岁,人情世故相当熟练。他见我经常翻阅那部百三家集而感到惊异,我也为他朗诵的吴梅村的《圆圆曲》和樊樊山的《前彩云曲》与《后彩云曲》而感到同样的惊异。“书不读秦汉以下”是我的教条,自然不知明末的吴梅村与晚清的樊樊山。我与谢砚谷恰好走了个反面。他是未尝读秦汉以上的书,我是未尝读元、明以后的书。这三日三夜的海程,成就了我和谢互相补课的机会,至少在我这方面是这样的。

我知道谢的姐夫在天津做官,谢也知道我有亲戚在天津海关工作,届时双方都会到码头接待我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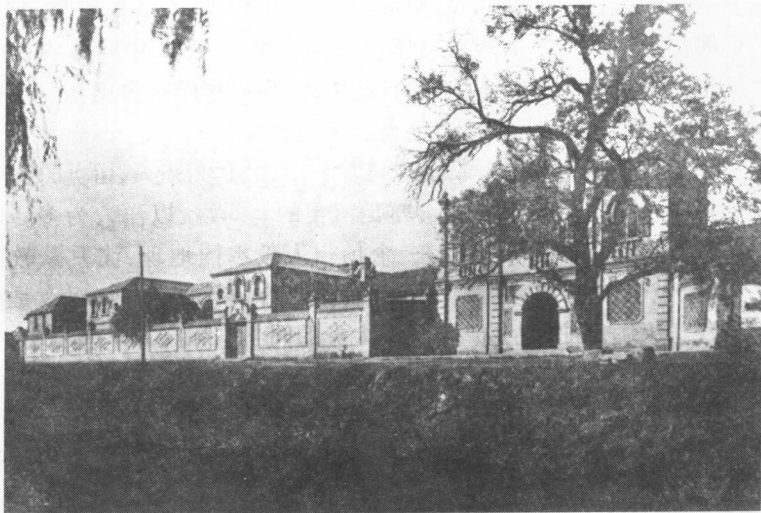
船到天津码头时已是暮霭迷蒙,果然双方都来了,我和那个亲戚从没见过面,是祖父写信告诉他的。现在却由谢砚谷把我介绍给我的亲戚,彼此不免大笑。谢的姐夫说,开学日期还有四五天,不如在天津玩一两天再进京吧。

于是我住在亲戚家里,谢住在姐夫家里。第二天上午,我与亲戚到谢的姐夫家里闲谈。谢的姐夫问我:“听说你有个表叔在财政部,是金事呢,还是司长?”我答,不大明白。我的亲戚说,出去玩玩吧。但天津没有可供游玩的公园之类。路过一丛洋楼,谢的姐夫说,这是南开大学。中午到了,我的亲戚提议上馆子。……我的亲戚同谢的姐夫争付酒饭钱,结果,二人平分。此时已近黄昏,我的亲戚提议听戏。……于是进了一个戏园,只见舞台前摆着二三十条狭而长的木板凳,已有人坐在那里,却是斜欠着身子,把耳朵对着舞台。后来知道南方人叫“看戏”,而北方人叫“听戏”,所以耳朵对着舞台。我们一行四人,也拣空位坐定。此时戏园中人声嘈杂,我的亲戚和谢的姐夫也在议论今晚的戏目,台上正演武打戏,锣鼓喧天,可是我竟坐在这窄条凳上睡着了。

第二天我和谢砚谷进京,火车在崇文门车站停下,卢桂芳(他

是卢表叔的儿子,那时在北京读中学,他比我小几岁,大名树森,表字奉璋)带了两个男当差正等着呢。

卢表叔早知道我和谢砚谷作伴来京,料想行李必多,所以派了两个男当差。



译学馆大门

桂芳表弟送我和谢砚谷到译学馆,这是两层楼的洋房,是预科新生的宿舍。课堂是新建的,大概有五六座,却是洋式平房,离宿舍不远。我问桂芳表弟,才知卢表叔任公债司司长,极忙。

谢砚谷上课二星期,他的姐夫通知他:南开大学招新生。谢砚谷又去考了南开,也被录取,从此我和他就分别了。

当时北大预科第一类新生约二百多人,分四个课堂上课。每个课堂约有座位四十至五十。至于宿舍(译学馆),楼上楼下各两大间,每间约有床位十来个。学生都用蚊帐和书架把自己所居围成一个小房间。楼的四角,是形成小房间的最好地位,我到时已被人抢先占去了。现在记得,一个是毛子水,浙江江山人,另一个是

胡哲谋,浙江宁波人,后来上课时才知道他是我的同班生而且同年。胡哲谋有个叔父在大学本科教数学,他希望胡哲谋也像他自己那样,成为数学家。但胡哲谋喜欢文科,他的叔父为此不悦,有“让他试一年再说”的话,这是胡哲谋自己告诉我的。

在沙滩,另有新造的简便宿舍,二三十排平房,纸糊顶棚,两人一间,甚小,除了两人相对的床位、书桌、书架之外,中间只容一人可过。取暖是靠煤球小炉,要自己生火;而译学馆宿舍则是装烟筒的洋式煤炉,有斋夫(校役)生火。

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理学院院长胡仁源(湖州人,留美)代理,预科主任是沈步洲(武进人,亦是留美的)。教授以洋人为多。中国教授陈汉章教本国历史,一个扬州人教本国地理,沈尹默教国文,沈坚士(尹默之弟)教文字学,课本是许慎《说文》。陈汉章是晚清经学大师俞曲园的弟子,是章太炎的同学。陈汉章早就有名,京师大学堂(北大前身)时代聘请他为教授,但他因为当时京师大学堂的章程有毕业后钦赐翰林一条,他宁愿做学生,期望得个翰林。但他这愿望被辛亥革命打破了,改为北大以后仍请他当教授。他教本国历史,自编讲义,从先秦诸子讲起,把外国的声、光、化、电之学,考证为我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,而先秦诸子中引用“墨子”较多。我觉得这是牵强附会,曾于某次下课时说了“发思古之幽情,扬大汉之天声”。陈汉章听到了,晚间他派人到译学馆宿舍找到我到他家中谈话。他当时的一席话大意如下:他这样做,意在打破现今普遍全国的崇拜西洋、妄自菲薄的颓风。他说代理校长胡仁源即是这样的人物。

教本国地理的教授是扬州人,他也自编讲义。他按照大清一统志,有时还参考各省、府、县的地方志,乃至《水经注》,可谓用力甚勤,然而不切实用。

沈尹默教国文,没有讲义,他说,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,如何博览,在我们自己。他教我们读庄子的《天下》篇,荀子的《非十

二子》篇,韩非子的《显学》篇。他说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及其互相攻讦之大要,读了这三篇就够了。他要我们课外精读这些子书。他又说《列子》是伪书,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,但《杨朱》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“杨朱为我”的学说。

至于文学方面,沈老师教我们读魏文帝《典论·论文》,陆机《文赋》,刘勰(彦和)《文心雕龙》,乃至近人章实斋的《文史通义》;也教我们看看刘知几《史通》。

清朝末年,江西诗派盛行,江西诗派的始祖是黄山谷……沈老师说他自己也喜欢黄山谷的诗,但他不是江西诗派。他还把他作的诗抄给我们看,可惜我现在一首也记不起来了。

同学中有问沈老师是不是章太炎的弟子?回答:不是,但又说沈坚士曾从太炎先生受“小学”要旨。同学中又有人问:听说太炎先生研究过佛家思想,是不是真的?回答是真的。沈老师又说,你们想懂得一点佛家思想,不妨看看《弘明集》和《广弘明集》,然后看《大乘起信论》。我那时好奇心很强,曾读过这三本书,结果是似懂非懂,现在呢,早已抛在九霄云外,仅记其书名而已。

至于外国文学,当时预科第一类读的是英国的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《艾凡赫》和狄福的《鲁宾逊漂流记》,两个外籍老师各教一本。教《艾凡赫》的外籍老师试用他所学来的北京话,弄得大家都莫名其妙,请他还是用英语解释,我们倒容易听懂。

预科第一类规定第二外国语(英文是第一外国语)是法文或德文,我选择了法文。教法文的法国人不懂英语,照着课本从字母到单字,他念,我们跟着学。幸而那课本是法国小学用的,单字附图,我们赖此知道该字是指什么东西,听说这法国人是退伍的兵,是法国驻京使馆硬荐给预科主任沈步洲的。

教世界史的(实际是欧洲史),是个英国人,用的课本是迈尔的《世界通史》,分上古、中古、近代三部分,上古从古埃及、两河流域的文化,然后希腊、罗马。此书附有插图(大概这是当时比较好的